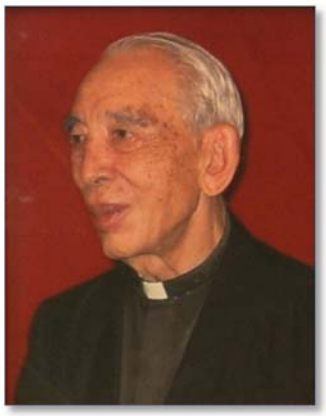
我的叔公



陳之祿神父（1917—2011）

我的叔公陳之祿，英文名 Paul Chan，故又名陳保祿，天主教神父，1917 年 10 月 11 日生於中國福建省福清縣江鏡鄉文房村，2011 年 12 月 27 日在美國紐約法拉盛居家壽終正寢，享年九十五歲。

我叔公陳之祿曾在香港華南總修院主修哲學和意大利羅馬宗座大學主修神學。1940 年在羅馬由教皇任命為神父，先後獲羅馬宗座傳信大學（Propaganda Fide University）神學博士（S.T.D.）和宗座拉特蘭大學（Pontifical Lateran University）教會法博士（J.C.D.）。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經輾轉去了美國，先是服務於舊金山華人天主教社團。由於中國大陸共產後，他無法回到他原來的福州泛船浦教區，便滯留在美國從事華裔學生服務工作。他被梵蒂岡任命為中國天主教中央局留學生服務處駐美代表，主要任務是為在美國和加拿大留學的華裔學生和學者提供精神和物質上的幫助。1950 年他成為流亡在美的南京總主教于斌紅衣主教的秘書，他們一起在紐約創辦了中美聯誼會，中國天主教信息中心和華裔天主教學生校友會，于斌主教在臺灣復辦輔仁大學時，他也盡了不少力。作為一個神學家，教會法律師和中國問題的專家，他時常活躍在北美各地，四處遊學講座。他精通中文，英語，意大利語，拉丁語等多種語言、以及福州和廣東方言。他為人隨和，性格活潑，洞察力敏銳，社交能力甚強，在于斌主教去世後接管中美聯誼會主席和中國天主教信息中心主任。

萬里奔喪

2012 年 1 月 5 日我料理完父親的喪事之後，6 日一早便匆匆忙忙從福州取道北京飛往紐約參加叔公的葬禮。多虧中美之間有著十幾個小時的時差，也多謝多年的老友周美玲女士，我一下飛機，她便直接載我到位於紐約法拉盛的中央殯儀館，讓我及時趕上了 1 月 6 日傍晚 6 時舉行的最後一場追思會，我是參加叔公追思會唯一有血緣關系的親人，而且是從他離開七十多年

的老家直奔而來的。特別要提的是 Anne Mary 黃小姐，她多年陪伴和照顧叔公的生活起居，處處為叔公操心，她和她的家人自始至終參加叔公葬禮的所有儀式。叔公的追思會和葬禮完全是西式的，整個儀式處處顯示著對逝者尊嚴的十二分敬意。對於虔誠的天主教徒來說，死亡固然悲傷，但也意味著永生並與全能的天主同在。

叔公的葬禮彌撒（2012）

叔公安息的公墓（2012）

叔公的葬禮彌撒於 1 月 7 日早上 9 時在法拉盛的 St. John Vianney 天主教堂舉行，彌撒由天主教布魯克林教區 Nicholas DiMarzio 主教主持，參加葬禮有教堂的本堂神父和神職人員，以及好幾位在紐約的華人神父，如原籍福州的江綏神父及接管中美聯誼會工作的何神父和李修士，黃小姐和她的兄弟姊妹，叔公大姐的孫子何易，以及諸多叔公的生前好友、熱心的教友和中美聯誼會的學生。彌撒禮成之後，我們護送叔公的靈柩到位於紐約上州『天堂之門』公墓下葬。到了中午時分，叔公的葬禮一結束，我也顧不上參加最後的午宴，便由周女士直接載我到肯尼迪機場乘上了回北京的班機，然後經轉廈門直接飛回新加坡。我之所以行程安排得如此匆忙，是因為在 12 月 31 日購買機票時，父親尚在人世，病情雖時有反復，但誰都不會料到他會走得那麼的快。

自從紐約回到新加坡後，我一直想寫些有關叔公和父親生平的點點滴滴，苦於公務繁忙，遲遲沒有動筆。叔公和父親與中國許多同輩人一樣，註定一生坎坷。他們倆既沒有血緣關系，又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度里，一生無緣謀面，也許是因為我的關系，好像冥冥之中在相互牽連著，在不到一周時間內相繼辭世。他們好像商量好似的，讓我有足夠時間奔波在中美之間給他們送上了最後的一程。

家的根源

文房村山坡遠眺江陰島（2003）

今年 6 月初，我和楓專程從新加坡背著叔公的遺像和他老人家用過一輩子的十字架重回故里——咱們的文房村。文房村座落在臺灣海峽西面福清半島的江鏡鄉邊緣，與江陰島相隔只有十幾里路。相傳從前，村里住著是王姓人家，故在福清方言中，文房仍然讀成“王房”。明天順年間，王姓無子，單傳一女，招了鄰近的樹下村一陳姓男子入贅，現在文房全村姓陳。其實，

文房村里不乏有外姓遷入，其中還有從南洋北漂來的印尼土著。但不管何方神聖，只要在文房村落腳住下，一概改姓為陳。相傳不是很久以前，大海漲潮時，海水可以一直湧到村旁，當時村里的很多父老鄉親都是以大海為生，後來幾次圍海折騰，原來的滄海現在都變成了荒田。也是不很久以前，村的正前方還有五座石頭山，一行排開，山上奇石林立，遠遠望去如同古時的筆架，文房因此得名；現如今山中的花崗巖早已被采挖一空，留下的是五個大坑。大坑除了坑人之外，還坑埋了從江鏡鄉各村源源不斷運來的垃圾和廢物，天氣炎熱時，百害孳生，奇臭無比。

文房村西望“石頭山”和樹下村（2005）

文房村有個很獨特的習俗，每年掃墓祭祖的日子是農歷三月十五，而不是清明節。據說清朝時，樹下村村民因打官司跟縣太爺杠上了，並且痛揍了縣太爺一頓，引來大批官兵進村抓人，也殃及同宗的文房村，舉村老少落荒而逃。等官司平息後，已經錯過清明祭祖之日，先祖便立下新規，從此文房村改成在逃難後回鄉之日，即農歷三月十五祭祖掃墓。

同宗的樹下村全村也都姓陳，漢代名臣陳寔公後裔，源自河南光州固始縣南院太傅陳邕公，後裔陳夔公，唐光啟三年（887 年）隨父偕兄弟入閩居閩清縣，後遷福清岐陽，為福清南陽陳氏始祖，後裔遷居福州石井巷，後遷江南下渡田墘，元至正元年（1341 年），仕泓公由福州下渡南遷福清樹下村。明天順八年（1464 年），仕泓公六世孫陳昌公從樹下村入贅到文房，生七子。我的叔公是昌公十六世孫，仕泓公二十一世孫。

據福清縣誌記載，天主教正式傳入福清，始於明代的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明天啟四年福清籍的內閣首輔葉向高士歸福建，道經杭州時邀請艾儒略入閩傳教，當時入教者不多。清雍正元年，清政府下令全國禁止傳播天主教，福清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改為書院。清乾隆年間，時文房村陳隸公，因家庭貧窮，偕江陰島洋邊村一嚴姓同往福建福安縣為富貴人家擡轎為

生。陳隸公與當地信奉天主教的一寡婦結婚，生三子，後攜妻兒回文房村定居，他們回鄉後堅持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便從福安又傳入福清，並代代相傳至今。在文房信仰天主教的一脈被統稱『教里』，『教里』出了不少神父和修女，其中包括我的叔公和我姑婆，前幾年文房終於有了自己的教堂——聖保祿教堂，聖保祿是文房村的主保聖人。

文房村聖保祿教堂（2012）

叔公父親的遺像

我叔公是我母親的叔父，他的曾祖依亞公育有承財和承寶兩兄弟，叔公的父親亞猴公是承寶公的二子，育有兩男、之善和之祿，和三女、淑惠、淑明和青玉。叔公的二姐淑明自小進了天主教的修道院，後來成了修女，2009 年病逝在福清天主教堂，享年九十七歲；他的三姐青玉體弱多病，十幾歲時帶病出嫁，過門後不久便病重身亡；他的哥哥之善，也就是我的外祖父，頗得乃父遺傳，身高馬大，俠義心腸，一生愛抱不平，卻也得罪了很多人，共產解放後土改時，他的仇人得勢，趁機把他扔入大獄，差點被斃了，無罪出獄後不久便染病不起，去世時年僅四十五歲；大姐淑惠早年生活艱辛、年輕守寡，晚年兒女有成、頤享天年，1990 年病故，終年八十四歲；叔公的大姐和大哥各育有兩男三女，其孫輩、曾孫和玄孫甚眾。

叔公的二姐淑明及大姐淑惠一家（1981）

叔公兄長之善的子女，珠明、亦玉、盟光和本明（2012）

叔公年幼喪母，他的父親獨身下南洋時將他們兄弟姐妹托付給他的叔父和嬸婆照應，他的叔父染上吸鴉片惡習，他的嬸婆持家無方且品行不端，孩提時的他飽受寄人籬下之苦，時常食不果腹，早上常是餓著肚子去上學，在『教里』聖母廳的聖母像前祈禱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課，也是他幼小的心靈尋求安慰的唯一途徑。據村里的老人們說，他從小資質過人過目不忘，在私塾念書時，四書五經，一遍便可倒背如流。我曾經向他求證過，他說一般他是看著先生的身影出現在祠堂的門口時才開始讀書，到先生坐下來上課時，他已經把該背的書全記住了。不過，他也說書是背了下來了，但對其中的意思卻是不甚了了。後來在羅馬讀書時，他好像是開了竅似的，突然間豁然開朗，兒時一知半解的四書五經和他做的博士課題竟然有諸多相通之處，對他短短幾年之內在羅馬連續拿下兩個博士幫助頗大。

等我曾外公從南洋回國時，看到家已不成樣子，便傷心地帶著二女淑明和幼子之祿搬到福清縣城，寄居在縣城的天主教堂里，曾外公幫著打理教堂里西班牙神父的生活起居。由於叔公生性聰慧好學，深受教堂里的神父喜愛和栽培，先後被送到福州天主教修道院和香港修道院就學，之後直接被送到羅馬繼續深造。當他學成後，時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全面入侵中國，被迫滯留在羅馬，當他啟程回國時，又恰逢中國共產後大力驅逐神職人員，只好幾經周轉後定居美國，終其一生。自從去羅馬求學之後，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他的故鄉。1984 年，在香港友人馬安義先生安排之下，他專程從紐約到香港探望從大陸來港的二姐淑明修女。跟大文豪林語堂先生一樣，他也只能站在香港北望故國，在心中默默祝福遠在家鄉的諸多親人。

叔公在香港華南總修院（倒數第 2 排左起第 6 位）（1936）

在我小的時候，特別是文革期間，除了外婆有時會嘮叨幾句外，家里很少會有人提起叔公的事情。聽說當時有人在國內某內參資料看到叔公的消息，說他是臺灣特務，他所在的機構是反動組織，也許是跟他的中美聯誼會隸屬於臺北總主教有關吧。在那個年代，有個海外關系就已經是很恐怖了，更不用說再扯上個臺灣特務。好在我們鄉下，老百姓純樸，官員也愚昧，大

家又是鄉里鄉親的，也沒有人願意去深究，我們自然也沒受到什麼牽連。倒是我本人因這海外關系反而受益多多，當我 1983 年從廈門大學畢業時，中國的政治氣氛相對比較寬松，叔公這個海外關系便成了我的擋箭牌，讓我躲過畢業後被分配到邊疆或到雲貴『三線』軍工單位的際遇。

我們跟叔公重新取得聯系也純屬偶然。1980 年初，我的大舅陳本良被診斷患上鼻咽癌，我的二舅陳本明陪伴著他在福州治療，由於沒錢住院，哥倆只好求助教會幫忙，借住在福州西門天主教堂。教堂里有位叫何敦乾神父，也是福清江鏡鄉人，他的老家田園下村與文房村相隔不過三、四里，何神父的年紀只是比我叔公小了幾歲，很有可能是叔公在福州修道院時的學弟。當時叔公的好友江綏神父剛好從紐約回福州探親訪友，與何神父見面時談起了叔公陳之祿神父在紐約的一些事。因為教堂住著兄弟倆也是文房村人，何神父便向我舅舅打聽叔公在文房親人的情況。也許是上蒼的垂憐，從此，我們便與叔公又聯系上了。由於當時醫療水平有限，加上家境貧寒，我的大舅當年便因癌癥復發去世，與我外公一樣，逝時也是年僅四十五歲。今年 6 月初我和楓去福州時，才獲知何敦乾神父已於 2009 年在福州去世，享年九十余歲。

叔公一直擔心因為他的工作性質會連累家里的親人，他共事的人當中有好幾個是共產黨的戰犯，如于斌紅衣主教、如雷振遠神父。我們跟他通信聯系都是由時在香港德貞女子中學任職的馬安義先生收轉的。馬先生，湖南人氏，寫了一手漂亮的毛筆字，他的草書龍飛鳳舞，如行雲流水，剛開始讀他用草書書寫的書信特別費勁，一封信往往要花上幾個小時才能讀懂，還是帶猜的，後來習慣了，再讀他的書信簡直就是享受書法藝術。我 1986 年去美國留學路過香港時，有幸在馬先生家書房里見到他當時正在為一出版社用楷書撰寫的國民黨大老陳其美傳，看得我是目瞪口呆，驚艷不已。可惜馬先生在八十年代末從德貞女子中學退休後不久就不幸在香港去世。

叔公與我

在叔公的大力幫助下，我於 1985 年獲得位於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坎市的貢薩格（Gonzaga）大學的校長獎學金，貢薩格大學是耶穌會神父辦的，學校免去我所有的學雜費，中美聯誼會同時授予我于斌紅衣主教獎學金，負擔我其它生活費用。由於簽證的問題，我到 1986 年 3 月才成行赴美，因為沒有托福成績，我只好從英文讀起。說實話，在貢薩格大學讀了一個多月的語言班是我這輩子讀書生涯中最有意思的經歷，我的同學有阿拉伯的王子和平民，西藏的流亡藏民，越南的修士，日本的空姐，越美和韓美的混血兒，黑的、白的、奶油咖啡色的都有。

1986 年夏天學校放假後，我便去了紐約跟叔公一起住在位於曼哈頓的中美聯誼會會所里。中美聯誼會會所與百老匯大道只隔兩條街，座落在著名的哈德遜河旁，一棟五層高的歐式古典

大樓，是紐約的地標，屬於被保護的建築。讓我吃驚的是我到紐約的第二天中午，叔公便讓我代他去參加一個叫『上海午餐俱樂部』的午餐聚會，去了以後才知道參加聚會的都是一些在中國共產時從上海租界被趕出來的美國商人、富翁和社會名流，因為他們的利益受損慘重，所以個個言行都極為反共，所謂的俱樂部的午餐會其實就是他們發泄不滿的地方。另一讓我吃驚的事是叔公在我到紐約的第一個周末就讓他的助手帶我到大西洋賭城去賭博。依他的說法是從中國出來的孩子都太單純了，應該去見見世面，好的壞的都應該慢慢接觸一些，免得到時不可自拔。現在想來，叔公的洞察力實在了得，我也沒有辜負叔公的栽培，我現在是逢賭場必賭，誓要賭遍全世界。

叔公與我和楓合影於哈德遜河旁（1986）

跟叔公一起生活最長的一段時間就是 1986 年的暑假，我在紐約呆了近四個月。當時，中美聯誼會會所里除了中美聯誼會和中國天主教信息中心之外，還有在美國天主教界中頗具影響力的雜誌『Homiletic & Pastoral Review』的編輯部，該雜誌總編輯 Kenneth Baker 神父的生活起居也在會所里。會所里常住的還有黃小姐和她的父母，以及 Bob Fong（我們平時都叫他“八寶飯”），他曾是美國大兵。我和後期到達的楓算是他們的臨時住客，楓跟我一樣，1979 年上的大學，1983 年畢業，1986 年 6 月到紐約，打算在紐約市立大學深造。開始時，叔公對我是既親切，又陌生，畢竟我與叔公以往從未謀面過。有空的時侯，特別是我們每天傍晚散步時，叔公總是要跟我談談與文房有關的事情，向我打聽家鄉和家里親人的情況，他很喜歡提起他小時候的一些趣事。

住在中美聯誼會會所里的每個人都要分擔做些家務活，我的任務是洗碗和倒垃圾，就是後來偶爾回到『中美』看叔公，洗碗和倒垃圾的活兒還是我的專利。為了讓我掙點零花錢，叔公還讓我把『中美』會所內從一層到五層所有的木質結構重新油漆一遍。油漆是個技術活，特別

是要去掉舊的漆，道道還真不少，比上漆要難多了，叔公有時候不得不親自出馬，手把手教我，他好像很在行，他還經常帶我一起到百老匯大道上的雜貨店買些去漆和油漆的工具。『中美』會所的內部結構頗為龐大，特別是從一層到五層的樓梯，四樓的舞廳和一樓的餐廳，木質結構非常結實且古色古香。我整個暑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油漆上，以至後來再回『中美』時，對會所內的木頭都倍感親切。順便提一下，會所內二樓的會客廳有一套非常古老的木質家具，據叔公說，那是從清朝皇宮幾經輾轉流落到了『中美』的；三樓的小教堂有一幅張善子先生的中式耶穌聖母畫，張善子是張大千的兄長和繪畫入門老師之一；三樓走廊有幅孔祥熙題跋的孔子巨幅畫像。

如果沒有叔公的精神和物質上的資助，我很難想像我能順利完成在贡萨格大學的碩士學業。就是我後來到華盛頓州立大學攻讀博士時，叔公和他的中美聯誼會還繼續為我提供了不少幫助。1990 年冬，叔公特意從紐約飛到華盛頓州普爾曼市來看望我們和我們剛出生不久的兒子，由於普爾曼的冬天冰天雪地、天寒地凍，室外溫度常常是零下三、四十度，所以叔公在華盛頓州的大部分時間只能呆在室內，這也讓我們與叔公有更多的時間溝通和拉家常。叔公很想念他的故鄉，福清和文房是我們永恒不變的話題；他很喜歡我們的兒子陳李閩，叔公說這小子很奇怪，一歲多了還不會說話，但能看懂帶畫的書，經常是看了兒童玩具廣告後，在商店里見了就想要，不給買就拼命地鬧。

叔公與我和李閩合影於愛達荷州劉易斯頓（1990）

叔公希望我和楓能繼承我們家族的傳統，繼續信奉天主教，但他也知道象我們這樣從小受共產教育的（他常戲稱我是小共產黨），一時半刻很難改變我們的信仰。雖然他經常會給我們灌輸些天主教道理，但從不勉強非要我們接受。真正引導我們信天主教和受洗的是我們在華盛頓州斯波坎市的鄰居蔡瑪爾大修女，她原籍北京，曾長期居住在關島，兩年前在威士康辛州去

世，享年九十有余。叔公 1990 年去華盛頓州看望我們時，曾跟她有一面之緣。為了銘記他們對我們的教誨和關愛，我們在為我們兒子和大女兒取英文名時，特地分別冠入他們的名字，即保祿和瑪爾大。

還記得有天我們一起駕車去斯波坎市看蔡修女，回程時大雪鋪天蓋地，路上時有暗冰、險象環生，他提議我們一起念經祈禱，祈求天主保佑，我告訴他我的天主教道理和經文是跟我祖母學，我只會用福清話念天主教的經文，他便也用福清話跟我一同念了天主經和聖母經。他說他有幾十年沒有用福清方言念經了，我還跟他開玩笑，說他的福清話中帶有很重的福州腔。後來在叔公的追悼彌撒上，江綏神父談了很多叔公的生平和與叔公共事的一些經歷，他特別提到叔公特有的帶有福清腔的福州話。

1992 年夏，我受聘於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任助理教授，我們舉家搬到紐約長島後，我和楓與叔公的接觸機會就多多了，我們經常會借著到唐人街購物時，順道到『中美』去看叔公和『中美』的老朋友。通過叔公和黃小姐的介紹，我們也有幸結識了居住在長島的 Tim 和他的太太朱美美，並和他們一家成了鄰居。Tim 是黃小姐的弟弟，祖籍廣東梅縣，客家人，從印度喜馬拉雅山麓來美留學，後來定居在美國，也是中美聯誼會的學生；美美祖籍臺灣，原是于斌主教的護士。Tim 和美美原來也住在『中美』，成了從『中美』出來的第一對。也許是緣分吧，我和楓算是從『中美』出來的第二對。1993 年初，叔公特意從曼哈頓驅車到了長島親自為我們的大女兒陳李融和 Tim、美美的小女兒黃美圓洗禮。

叔公在長島 St. Frances Cabrini 教堂為李融和美圓洗禮（1993）

自從我 1993 年夏辭去紐約州立大學的教職，全家移到新加坡之後，我們與叔公相處的機會就屈指可數，我們多次邀他老人家來新加坡跟我們小住一段時間，終因年邁行動不便，沒有成行；他說他當年從香港去羅馬時，曾經路過新加坡，當時的新加坡剛剛開埠不久。

記得我來新後第一次回去看叔公是 1996 年，當時我是先到舊金山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然後特別拐到紐約；1998 年夏我去費城參加美國控制會議時又順道去了紐約。我和楓以及三個孩子全家一起與叔公唯一的一次團聚是 1999 年冬，當時孩子們都還小，最小的陳李文才只有五歲；我們一家大小都住在『中美』會所里並與叔公一起過聖誕節，其樂融融，叔公對我們的到訪非常歡迎，我們都很開心；唯一遺憾的是那年聖誕節期間，紐約沒有下丁點兒雪，三個小孩都挺失望的。後來孩子們慢慢長大上學了，我們一家一起去看叔公的機會就變得少多了。

我們一家與叔公在『中美』共度聖誕（1999）

我原本打算 2001 年年底去佛羅里達州奧蘭多開會時，在紐約停留幾天，可是碰上了“911”，後來不得不取消行程。2003 年夏天，盡管“沙斯”肆虐，我還是乘著去加拿大蒙特利爾開會時，與幾個朋友一路驅車先是到多倫多，然後途經尼亞加拉大瀑布，最後到了紐約並住上幾天。每次去看叔公時，他總是要帶我去位於百老匯大道的一家中餐館，他很喜歡這家餐館，價錢公道，還能喝上一杯免費的白葡萄酒。他上館子時都要穿上他的神父衣服，就是天氣特別熱的時候，他也要至少帶上一個羅馬領。他還說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也喜歡去百老匯大道的中餐館，偶爾還會在餐館里碰上阿里。楓在 1986 年就曾經在中餐館遇見過拳王。

我 2007 年夏天去紐約參加會議時，叔公已經退休並搬出中美聯誼會，居住在法拉盛的中國城附近。叔公當時已經有九十歲高齡，行動有所不變，但思維還是相當敏捷。也許覺得自己已是風燭殘年了，當我與他道別時，他突然告訴黃小姐說這也許是他和我的最後一次會面，當時我的心情莫名非常。2008 年歲末，我和楓帶著兩個女兒再度去紐約看望叔公，遺憾的是我們的兒子當時正在新加坡特種部隊接受國民服役，無法與我們同行，叔公很想念他。2008 年的聖誕沒有讓兩個女兒失望，平安夜晚我們與叔公和黃小姐在法拉盛的 St. John Vianney 教

堂一起參加了平安夜彌撒，教堂外大雪紛飛，教堂里喜氣洋洋，這是我們與叔公共同度過的最後一次平安夜。

叔公與我攝於中美聯誼會（2003）

我和楓本來還計劃今年去加拿大蒙特利爾時再次順道去紐約看叔公，這個奢望再也無法兌現了。造物弄人，這篇文章卻始於我這趟蒙特利爾之行。

叔公的身體狀況大概是 2011 年下半年開始出了問題，先是頻頻尿血，醫生診斷說是與他的前列腺老毛病有關。後來是胃和消化系統的毛病來了，在醫院里住了一段時間，多虧黃小姐的精心照料，他的病情好轉了很多。遺憾的是他出院後不到兩天，不小心從他的辦公椅摔下，折斷了腿骨。當他再次入院動了手術後，他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我最後一次通電話是動身去南美洲開會之前，叔公當時的神智已經不太清楚，但他還是可以意識到是我在電話里跟他說話，他與往常一樣，詢問福清家鄉的親人好不好呀。我會特別記住叔公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那是他的一生中除了宗教信仰之外的重要個人信念，我也相信他所說的。

叔公對他一輩子信仰的天主教和耶穌基督深信不疑，始終如一。他一生幫過的人數不勝數，光是中美聯誼會的學生就有數千人之眾，其中不乏有社會名流和事業有成者。叔公對我恩重如山，如果沒有他老人家當時的支持和提攜，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事業。叔公，楓和我會永遠銘記您的教誨，我們會沿著您的腳印，盡我們的微薄之力去多幫些貧苦的孩子求學成才。我們期待旅美作家王慶餘先生早日完成您的傳記，讓我們和我們後代對您不平凡的一生有個更完整的了解。

叔公，您在天之靈安息吧！我們會常常為您祈禱。願全能的天主與您同在。

叔公與我和楓合影於法拉盛中餐館（2008）

平安夜彌撒後叔公與教友道別（2008）

陳本美

2012 年 6 月 28 日初稿於加拿大蒙特利爾市
6 月 29 日續稿於從多倫多飛往北京的途中
7 月 9 日完稿於從北京飛往新加坡的途中
2012 年 7 月 12 日於新加坡由何楓修改後定稿